

当人们还在热议研究生竞聘卷烟工、送外卖、当司机、做保安之时,新一年的研究生备考“战役”已然打响。

《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北京多家考研“培训工厂”了解到,半年的考研集训营(脱产类)花费3万元起步,有些甚至高达6万元,且不包食宿。即便是在线网课,一些培训班挂出的价格也高达两三万元。针对在职研究生的培训收费也达到1万元至3万元不等。

恢复研究生招生40余年来,我国相关招生人数快速增长。今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10.7万人,与1978年(10708人)相比,增长了100倍有余。

近年来,研究生“高学历低就”“大材小用”的“内卷”现象引发了研究生过剩、质量滑坡、读书功利化等诸多热议,也让公众对研究生的能力和读研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是否该拿出“血本”,投入时间读研?这是很多人的疑问。

读研“三难”皆因“卷”?

909万,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数字背后,蕴藏着无数的喜怒哀乐和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对于很多像李晓琳这样的应届研究生来说,或许可以用一个字——“难”来描述他们的处境。

今年29岁的李晓琳刚获得北京某“双非”高校(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外语专业硕士学位。把自己划归为“大龄”读研群体的她,对这段学历教育的体验并没有当初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考研两年,加上读研两年,砍掉了90%的娱乐时间,四年没过正常人的生活。读研期间几乎相当于免费给导师打工,论文得不到有效指导,身心俱疲。”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吐槽”。

考研难、读研难不说,更让她灰心的是,付出和回报没有成正比——就业更难。

本科毕业后,李晓琳在私企和培训机构之间兜兜转转好几年,现在她学历高了,求职却似乎回到了原点。今年以来,她投向心仪的事业单位和大公司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小私企的工作她又看不上。“要不要回内蒙古老家当老师?”她在纠结。

近年来的扩招已经让研究生过了“物以稀为贵”的时代。

“以经济学的原理解释,供求多了,价格自然下降。就像荔枝等水果多了,就会卖得便宜。研究生数量大大增加之后,自然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找到好工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沈文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每年招生人数飞速增长。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1世纪第一个1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2001年的15.9万,增长到2010年的47.20万,增长了三倍多;第二个1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再翻一番。

对于个人来说,显著的数字增长不仅意味着学历的贬值,同时也意味着它正在成为职场的人职“标配”。

这种现象在一些人眼里正应了时下的热词:“内卷”。这个从社会学领域破壁出圈的词原指“没有发展的增长”,在研究生教育中,则被用来描述非理性的内部竞争,让身在其中的人不自觉陷入“囚徒困境”,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参与其中。

“‘没有研究生学历不要。’这种学历歧视和文凭过度消费,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人为导致不必要的‘内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对《中国科学报》说。

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在今年一些应届毕业的研究生还在为工作没有着落而焦虑时,新一轮的研究生备战已然开始,许多考研“培训工厂”的报名十分火爆。

在沈文钦看来,这种溢价或许与市场供需有关,因为名校研究生就像市场上少量的“高端水果”,受扩招影响不大。

对当前每年三四百万的“考研大军”来说,为达成未知结果的期望,付出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成本。

作为一名“二战”备考考生,来自山东的尹小强很清楚,由于扩招速度赶不上报考人数增长速度,推免生占用名额比例增加,加上在职研究生被纳入统考,现在研究生“越来越难考”。特别是42所“双一流”高校的推免生比例,普遍接近教育部规定的50%上限。

“但必须考呀!学历不能说增加你的竞争力,至少会降低你的被淘汰率。”尹小强曾在百度实习了三个月,直系“老板”是复旦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觉得对方在眼光上要比普通本科生长远得多。虽然去年“一战”失败了,但也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

“我愿意吃研究生的苦,只要我能考上,这样才能为就业增加更多的筹码和机会。”因此,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瞄定了北京某“双一流”高校的计算机系。

尽管不乏尹小强这样的“勇士”,但也有人在看清考研形势后进退维谷。王会娟就在犹豫要不要加入考研大军。去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刚入职某出版社的她在工作时常被问到“是哪个学校的研究生”,每当此时,她就觉得有点尴尬。

“我想去的学校很难考,‘双非’的考上也没什么用,也想出国读一年,但费用有些高,我父母觉得花那些钱还不如先在二线城市(买房)付个首付。”工作一年多,这个来自安徽的姑娘还在为读研“划不划算”纠结。

“过剩”是个伪命题?

对于今天的研究生来说,“内卷”似乎已变成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研究生做外卖骑手、当司机、做保安、卖房子……各类“高学历低就”“大材小用”的案例不胜枚举。“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存在某种‘降维’的情况,大学生越来越像以前的高中生,研究生越来越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被指过剩、贬值、水分大

研究生教育“降维”真相

■本报记者 冯丽妃

像以前的大学生。”刘永谋感慨道。

不过,多位专家表示,尽管研究生学历有所贬值,但数量并不“过剩”,因此应谨慎使用“内卷”一词。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过剩意味着供大于求,而从多个角度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并非如此。如从考生端看,考研需求仍然旺盛,并非人人都能够读研;从毕业生端看,不同领域过剩与不足并存,一些专业的毕业生甚至供不应求。

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达到51.6%,刚突破50%的关口,说明我国才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仍有上升空间。

而据202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我国各行业从业者研究生教育比例仍然偏低。例如,研究生学历仅占总体从业者比例的1.1%。在公认“研究性最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研究生学历从业者所占比例仅为10.7%;教育领域其次,占7.4%;金融和信息服务业紧随其后,分别占5.2%和4.4%。“由此看来,我国的研究生从业者存量不足,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彭湃说。

沈文钦也表示,当前我国在诸如医生、护理、师范、人工智能等学科方面的研究生依然存在大量缺口。同时,研究生扩招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来说,意义也不同。个体(考研者)永远受制于大形

势,会比较被动,而竞争就意味着更累、更苦,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努力和代价。

但对于国家和高校来说,考生人数多则有利于选拔出更多、更好的生源,因而也是好事。特别是当前专业硕士招生比例在持续增加,且这一群体学费更高,所以很多学校有动力去扩招。

“如果看不同省份就业人群研究生学历的比例,就会发现我国的研究生根本不是过剩,而是稀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对《中国科学报》说,如果我国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可以去中西部地区当中小学老师,就不存在“隐形失业”和“人力资源浪费”的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也能大幅度提升。

“一句话,研究生过剩问题牵扯到研究生教育的总体结构。”刘永谋表示,就直观感受而言,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可能比速度问题更重要。

教育质量“水分”大不大?

与研究生“过剩”这一问题类似,我国研究生培养人数“高歌猛进”面临的另一广泛争议是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水分”太大。

对于这一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专家们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学历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年初统计,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86万人,而当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为874万,高校毕业生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比例达74%。

根据“十四五”规划,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十四五”结束时将达到60%(在2020年,该比例为54.4%)。届时,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具体而言,研究生的招生和就业也将呈现更加激烈的竞争状态。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呢?

优化质量 挤掉“泡沫”

尽管当前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已突破百万,但千人注册研究生数——在学研究生数除以当年全国人口(单位为千人)所得数值却很低。2018年我国这一数据为1.96,而美国一直保持在9人以上,英国为8人以上,加拿大为7人左右,韩国是介于6人到7人之间。我国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在未来10年到15年时间内,我国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但这必须是保障质量基础上的规模发展,否则可能导致研究生进一步“贬值”。

如何挤掉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看来,要把好“质量关”,首先必须严把“入口关”和“出口关”,让“混文凭”的人“混”不出来,不达到质量标准绝不放行。

同时,研究生培养还要紧扣研究能力的培养。“现在,研究生教育开设大量知识型的课程,还是搞‘满堂灌’,这对于培养创新能力不利。”他说,研究生课程应该与科研相结合,更多采取高级研讨班的形式进行教学。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刘永谋支持“研究生质量下降”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尽管扩招并不必然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但与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不匹配的过度扩招会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

“现实来看,现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确在不断下降。”他说,其具体表现有,扩招导致生源“注水”,很多学生没有学术理想,只想“混”一个文凭;教授岗位也“注水”,招的学生多了,导师很难像以前一样对学生“精雕细琢”等。此外,还与教育资源有关。虽然国家加大了投入,但相对而言研究生人均能享受的资源在减少。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大学文化(指大专以上学历)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相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人口增加了近1亿。

“这一发展速度是惊人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中国科学报》说。他同样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也出现了许多“高分低能”与“学历高消费”等人才培养、使用问题。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就是希望各行各业从业者都普遍接受高等教育,有更高的能力与素质,而不只是拥有一个大学生身份,否则就会导致学历高消费、高学历低就业现象。”他说。

不过,在沈文钦看来,不能夸大扩招引起的研究生群体质量滑坡。他表示,研究生规模扩大后,

表示,“十四五”末期,我国专业硕士要占到研究生总招生规模的2/3,目前与这个目标仍有距离。应加快培养速度,向企业“输血”,解决企业研发中的实际问题。

“在学生获取补助方面也应该有学科差异。对于一些要坐‘冷板凳’,回报率不高,但却对国家有用的基础学科,应该提供更多支持,让这些学科的学生基本上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做研究。”彭湃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主任沈文钦也认为,未来应更好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目的。同时,对于一些国家急需但个体需求不那么强的专业,可采取补贴、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学生就读。

不止如此,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看来,还应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吸引硕士、博士研究生到非一线城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发挥作用。“现在,我身边的博士毕业生宁可在北京高校当辅导员,也不愿意去非一线城市的著名高校担任教职。”他无不遗憾地说。

严监管 强自律

去年,我国高校清退了上千名超期研究生,这被舆论解读为“从严”要求。对此,熊丙奇表示,研究生应当自律,考上研就要对自己负责。他同时表示,相关部门还要在过程管理、过程评价等方面对研究生教育进行“从严”管理,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健全导师制,对学生的质量负责。

沈文钦也表示,如今一些高校发生的研究生买卖论文以及文章造假情况,对文凭市场造成冲击,对国家教育资源也是很大浪费。因此,除要求研究生加强自律,监管部门需“严把质量关”。

好生和差生都会增多,方差就会拉大。但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把精英挑出来,还要让每个进到教育体系里的人都能够有所发展,国家也从中受益。

“我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有几百家,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在所难免。严格来讲,在一些培养条件不大好、生源条件不大好的学科点,存在指导不到位或质量危机的情况。”他说,但很难就此得出学生整体质量大幅滑坡的结论。

他举例说,1981年到~2004年间,我国生物学领域只在《细胞》上发过一篇论文,但现在我国科学家每年在CNS(《细胞》《自然》《科学》)等顶刊上发表的文章已颇为不少,其中很多是学生参与完成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优秀的学生更加优秀了。

沈文钦参与的全国研究生毕业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对读研期间个人能力增长整体评价十分积极,接近9分(满分10分)。在访谈计算机领域的院士专家时,他获得的信息是,这一领域中一批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能力很强,超过上一辈学者。

“除了文史哲等不太受学术范式更新影响的学科之外,在知识更新迭代更快的经济学、生物学、计算机等领域,现在的学生不比以前差,甚至可能更好。”他说,“不同时代成长的人有不同的优势,老一辈的学者语言表达能力、文学修养更强,而今天的研究生英语更好,阅读文献更多,动手能力更强,这些都是他们的优点。”

在彭湃和李锋亮看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也要换个眼光看研究生教育——更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的“多元化”。

“如果只从科教人才培养角度看,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肯定受到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当前研究生读研的动机以及培养政策的设定都是多元化的,不能仅用过去的评判标准评判现在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并得出下降的结论。”彭湃说。

彭湃主持的全国硕士生学习和发展调查发现,当前有近七成研究生读研是为了提高综合素质,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只有不到4%的硕士生是因为学术研究兴趣去读研。这说明,尽管名字中有“研究”二字,但研究生的读研需求已经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

李锋亮也持类似观点。他并不认同研究生教育质量整体下降的判断。“如果从投入等指标来看,研究生教育质量没有下降。而如果是依据研究生的精英化程度来评判,也是不对的。”他说,“比如拿40年前和现在读高中的人群相比,显然40年前的人群更加精英化,但由此便认定现在的高中质量比40年前的高中质量差,这是荒谬的。”

在他看来,研究生的目标更加多元也是合理的事情,且研究生教育有很强的溢出效益,除满足研究生个人发展外,也有助于这些个体周围人群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现在研究生教育更加多元,就应该用更加多元的质量观去分析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他补充说。

读研“功利化”不可不取?

近日,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大学生招聘拟录用名单引发热议,因为其“一线生产操作岗位”拟录用人员中,有不少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等“双一流”高校的研究生。

这则消息招致了“研究生丧失理想”“追逐垄断行业工资”“读研功利化”等批判声。其背后反映的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一些人考研动机不纯,不管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先拿个文凭,好晋升、加薪,或是在婚姻市场上找个“当户对”的嫁妆。

那么,研究生教育是否有义务满足这些“功利性”的需求呢?此次采访中,专家们对这一问题也持不同观点。

沈文钦认为,高校的根本是学术,没有义务满足这种需求。其任务就是要提升人力资本,通过教育使学生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

刘永谋也持类似看法:“研究生扩招降低门槛,让以就业为目的的获得者获得加入研究生队伍的机会。换句话说,不是研究生丧失理想,而是本无学术理想的人来读研了。”

在他看来,这与整个社会“文凭过度消费”有关,其实很多工作完全没有必要设定研究生这一门槛。“这种不合理的要素和‘学历歧视’(没有研究生学历不要)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人为导致不必要的就业‘内卷’。”他说。

同时,“文凭过度消费”刺激大学生报考研究生,加剧考研竞争压力。为了就业而考研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本来就无心学术,这也导致研究生培养质量下滑。

不过,在彭湃看来,当前中国基本上已经是学历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读研究生、追求更高的学历是基本的权利。这一现象不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存在。“比如有的已经工作了几年,想要提升自我,或是换专业谋求更好的职位待遇,这是其基本权利。”

他表示,一方面,这是由学历教育本身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通过接受教育来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或人力资本),这是最常见的教育功能;而文凭还有另一种信号作用,它可以让拥有者“自带光环”,从市场筛选中脱颖而出。

另一方面,研究生的读研动机和需求肯定是混合的。不可否认,一部分人是纯粹追求一个文凭,因为这对某些行业或岗位是“硬杠杠”,是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求。“如果教育让人得到了发展,不管是发展了多少,都应该有义务去满足他。”他说。

不过,彭湃表示,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如在考研,尤其是争取保研机会时的功利化,表现为“GPA(平均学分绩点)竞赛”。“大家都去拼命提高自己的学分,变得和中小生有点像,还有一些人甚至为此和导师搞关系。这些不太正常的功利化行为不应鼓励。”

“我不反对个体怀着世俗的目的读研究生,但是我们更应该鼓励研究生个体更加高尚。”对此,李锋亮说。(受访学者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